

东北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

王 钧

抗联进军前的呼伦贝尔地区形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呼伦贝尔地区也很快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呼伦贝尔地区执行一条“以华治华”的毒辣政策，利用旧有的统治体制，利用和操纵地区的上层官僚继续奴役和统治各族人民。

日本侵略者极力在政治上挑拨各民族的关系，散布什么“日蒙亲善”、“满蒙联合”、“东北是满蒙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满蒙等民族是满洲国的主人”、“要维护满蒙等民族的地位”等等。妄图破坏我民族团结，以便从中巩固其殖民统治。

日本侵略者在积极推行分化民族团结这一毒辣政策的同时，也大力加强军事统治。他们设立了兴安四省，建立了兴安军，组成兴安军区，兴安军官学校和各种骑兵警察队等军事机构。扎兰屯为兴安东省，乌兰浩特为兴安南省，海拉尔为兴安北省，哲里木盟的开鲁为兴安西省，更进一步控制了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而日益明显起来。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配合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瓜分世界的侵略战争，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在这一地区的海拉尔以南约三百公里处的诺门汗（哈拉哈河）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一举吞并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片领土。他们调动嵯峨中将的第二飞行集团军，安岗坦克支队，以及步兵第六军等精锐部队五万人和近万名满军主力部队——兴安军投入战斗。

诺门汗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第二次向共

产党领导的国家进行挑衅。这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由朱可夫率苏联红军的陆空军支援蒙古人民共和国，参与了这一战争。中共北满省委为支援苏联共产党人的反法西斯斗争，也立即调动了抗日联军的几个主力团，由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率领，开赴与呼伦贝尔仅一江之隔的讷河和嫩江两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主动攻击、扰乱日军后方。冯志刚同志曾率我领导的六军十二团，姜福荣领导的三军八团和刘耀廷领导的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发动了讷河战役。一举攻克讷河县城，全歼日本守备队和北大营的伪满军一个团。活捉该县全部日伪官吏，将存放在该县的军用物资全部烧毁。又连续缴了几个警察署和自卫团的械。而后，三军八团开赴北安、通北一带。六军十二团、军部教导队和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连续向日军后勤纵深部进攻，在唐大火犁屯附近烧毁日军给养汽车八辆，打死护路队广濑中佐指导官以下一百八十名日军，伪军全部投降，又连克敌伪重要据

点六处。军威大振，影响甚大。日军急忙从诺门汗撤下伪满军主力石兰斌、王洪、孙强等部队，加上几支日本守备队与我作战。我们在地方党和群众的帮助下，全歼了孙强部队，歼灭了王洪部队的一部分，争取了石兰斌部队反正。日军在诺门汗战场正面又遭到苏联红军重大杀伤，日军在首尾不能相顾的情况下，不得不于九月十六日宣布在诺门汗停战。

首次进军呼伦贝尔

中共北满省委在日军屡遭失败和我军节节取胜的大好形势下，决定开辟呼伦贝尔游击区。准备在大兴安岭里的加格达奇、阿里河一带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后方。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北靠苏联，东靠我军开展的讷河、嫩江游击区，西部紧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我八路军冀热辽根据地接近，便于我军纵横运动和进退，并有可能通过国

际路线或通过辽西与党中央、八路军取得联系。

一九三九年冬，我军组成西北远征指挥部，以六军参谋长冯志刚同志为指挥，我当时由六军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提升为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率军直教导队和十二团（全部是骑兵）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越过冰封的嫩江，到达莫力达瓦旗境内。这是历史上我党我军第一次到达这个地区。

莫旗是达斡尔、汉、满等族杂居的地区，民风淳朴。我们一到莫力达瓦北部的小库木尔屯时，群众像欢迎亲人一样来欢迎我们。他们和东三省和全国人民一样，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屯子里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该屯最德高望重的孟哈苏（达斡尔族，敌人让他当嘎查所长。嘎查所相当于村公所）亲自召集群众。老乡们一听到通知，都倾家而出，不大一会儿就聚集了四百来人。冯参谋长让王万俊付官在一个土堆上展开红色军旗，并让我讲一讲我军的来意和我们对兄弟民族慰问之情。我一

登上土堆，群众一下围了上来。我说：“我们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是帮助各民族百姓的队伍。日本鬼子想挑拨我们中国的各民族自相残杀，妄想利用极少数的民族败类达到以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政策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国在千百年前就是一个有很多民族的大国。我们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我们各民族只有抱成一团，一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救中国，才是我们的真正出路。”

“我们是东北老百姓的队伍，纪律严明，对乡亲寸草不动……。”还没等我的话音消失，人群中一位身体很棒的三十来岁的达斡尔族兄弟叫沙特勇的，攥着拳头，自己走上土堆，大声说：“这个队伍真好啊！和咱们一条心。乡亲们！大伙一块儿打他日本狗杂种！”接着，司务长王成给各房东分发饭伙钱。

大会散后，孟哈苏老人张罗把战士分到各家去，各户都忙着给部队做饭吃，我们指挥部就住在孟哈苏老人家。孟大娘对我们非常热

情，把我们让到三面带炕的正房里，把发好的酸牛奶给每人倒了一大粗瓷碗。由于汉族同志们不习惯喝酸牛奶，所以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地笑着，谁也不喝。老大娘表现出那种真心实意的心情，感动得大家只好当着老大娘的面把牛奶喝了下去。接着她又端上热呼呼的野猪肉和小米饭。饭后，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唠得非常热乎，两位老人提出了叫他儿子孟德仁和我们领导人拜兄弟的要求，冯参谋长让我和王付官和孟德仁结拜。孟哈苏老人倒上酒，孟大娘点燃了佛龕上的香。我那年二十六岁，算老大哥，我端杯先说，咱们哥仨，为打日本，救中国，生死与共。二十来岁的孟德仁火气更旺，他说：“大哥、二哥、你俩前头走，弟弟我紧跟着。”孟德仁同志自此就参加了革命，他是呼盟少数民族中参加革命最早的人。从此，他经常为部队带路，筹买给养，买战马。我军走后，他被日本鬼子和警察、特务迫害，就改名换姓，自报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

中游猎，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一直坚持到解放。一九六三年经我证明改回达斡尔族，现在在乌尔其汗林业局工作。

由于我们部队异常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工作，我军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莫力达瓦旗地区。这一带群众都称我们是新军，是千百年来从没见过的纪律严明的部队。

部队由小库木尔屯出发，向西南走五十多里，来到靠近边壕（古时划分区域的长壕，这条长壕是从嫩江江沿起一直向西延长的）的乌尔科屯和冯家围子屯，被群众围了起来，男男女女都眉开颜笑地望着指战员，部队在这屯住下后，该屯的嘎查达向我们报告说：“我们这个屯子没有一个人跑出去向日本鬼子报告，我们说了算，谁也不能跑。你们好好休息罢！”嘎查达要给我们杀猪宰羊，被我们一一说服制止了。

我们又到了边壕北的王家炉屯。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的美名早已传到这里，这屯的群众更

是热情。我团有一个高大个子的战士叫孙大发，他刚到一家屋里，就被一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大娘推上了火炕，为他脱下鞋，并给他捂手，扫脚，并连连说：“孩子！你们遭罪了，天头太冷。”又忙打发儿媳赶紧做饭。感动得孙大发直落泪。群众关怀抗联战士，教民族语言，为战士洗衣服、治病。战士也积极为群众做好事，如扫院子，挑水，劈柈子等干个不停。军民之间真是亲如一家。

首战太平庄

一九三九年腊月初六，我军来到格尼河西的太平庄屯时，从屯外飞似地跑回一位骑光背马的达斡尔族姑娘，她向我们报告说：西南方来了警察队。为避免群众利益受损失，冯参谋长决定部队拉出屯去。我们抢占了屯外的一处山坡。我用望远镜一看，前来的敌人是清一色着黑色制服的达斡尔骑兵警察队，有二百多人。

这将是我军进入呼伦贝尔地区的首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败对我军军威和取得群众信任有重大影响。我军兵强马壮，取胜是比较容易的，但来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一时被日本人蒙蔽，如果将他们全歼，会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感。于是，冯参谋长决定，一面让部队用火力镇住敌人，不让他们向前，一面展开政治攻势。军部付官长祁宝贤（相当师级）同志亲自带一连排长小于，前进到离敌人只有二百米的地方，向警察队喊话：“汉族、达斡尔族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警察队首先开枪，祁付官和小于同志都牺牲了。祁宝贤同志原是伪军三十八团的一个连长，学生出身，有爱国主义思想进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于一九三七年七月率部起义，投归我军，对于这位非党同志，省委极为重视，提升他为六军副官长，牺牲时只有三十四、五岁。

两个战友的牺牲，我军指战员全冒火了。冯参谋长瞪着眼向我下令：“要全部活捉敌

人，不准打死一个。”我即指挥全部机枪一齐射击，组成交叉火力网，将敌人压倒。然后率骑兵从左、右两路一个冲锋，飞快地逼到了警察队的近前。在我们的马前枪口下，警察们乖乖地交了枪，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冯参谋长压低火气给他们上了一堂爱国主义的课，然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抓住了他们的战马，把人全部释放了。

这一仗我军打得有理、有节、有利，军威大振，远近群众见到我们都伸出大拇指，说我军是常胜之军，仁义之师。有不少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参军。我记得最出色的有两人。一是蒙古族青年郭刚，他是伐木工人，个子高大，脸色黝黑，他在山里顺着我们的脚印一直追了七天七夜，才追上我们参了军。郭刚同志作战勇敢，不久就入了党。一九四〇年北兴镇战斗中，他发现敌人一挺机枪正在向我瞄准射击，就用身体挡住我，并向敌人还击，当他把敌机枪射手打死时，他自己也身中十一弹，躺在我

怀里牺牲了。另一个是朝鲜族战士，我只记得姓金，是山上放排工人，他非常能吃苦，又能团结人，后在大兴安岭现在老林场附近战斗中牺牲。

任家窝堡冯参谋长殉国

腊月二十六，天阴沉沉地飘着大雪。天快黑时，部队来到阿荣旗北部三岔河的中游。这里有个屯子，名叫五马架。部队进屯后，事务长买点米，正组织做饭，我召开群众大会，正在讲演，岗哨跑回来报告说，从东边开来一大溜汽车。冯参谋长和我来到屯头观察。敌人来的真不少，足足有三十辆日军尼桑牌装甲大汽车，上面尽是黄乎乎的日本兵，有的车后面还拖着大炮。估计是日军一个正规军联队。

冯参谋长立即命令部队捞起半熟的米撤出屯去，到后面山岗上进一步观察。敌人一看到我军上山，就用九二重机枪和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向山坡上射击。由于天黑敌人打不准，我军没有伤亡。

我们又往后撤到敌人火力射程之外，在山上露营，并接着做好饭。

冯参谋长把我叫到他的火堆旁。他的警卫员小裴，煮了一大饭盒小米饭，我们三人一人轮流吃一口，一块冻咸菜疙瘩还是冯参谋长用牙咬开，我们每人一块放在手心里。冯参谋长边吃边说：“敌人这么多，又是正规军，他们定会在明天与我们打阵地战。今晚他们这么多人，一个是返回莫力达瓦旗去住，一个是找大一点的屯子去住，决不能住在五马架这个小屯子。”我点点头说：“日本鬼子来这么多，估计是从齐齐哈尔来的，附近的敌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兵力。”

冯参谋长同意我的分析，又命令我明早吃完饭后，带队往西往三岔河上游走，寻找战机，歼敌一部后，再迅速摆脱敌人。

第二天（腊月二十七日）早饭后，我率部队往西南运动，因夜间不知敌人兵力的调动情况，便派出尖兵，先出一华里，随时观察各沟

塘边有无汽车的胶皮轱辘印（当时当地的大车的车轮都是木制的，无胶皮车胎），以便确定前方有无敌人。

部队走了三四个钟头，下一个山沟后又往山上爬，想踞高临下观察四周有无敌人。

我军第一次到达这里，地理环境不熟，根本不知道这座山的那面就是三岔河主流，河北沿有个屯子叫任家窝棚。

正走着，我们看见走在前面的尖兵突然朝我们比划，是说前面发现了汽车轮的印子，有敌情。冯参谋长立即下令部队戒备，并让我组织部队作好战斗准备，他自己带着警卫员小裴策马跃上南面山坡。冯参谋长作战向来惯于亲自掌握第一手情报，这次他又想上到山顶上想观察一下敌人的方位和情况。

我一边下令全体战士下马，准备迎战，一边看着冯参谋长和小裴，眼看他们快要上到山顶了，就在这时，山顶和一侧山坡同时响起了枪声。

原来头天晚上有股日军就在任家窝棚宿营，今天一早他们分两路往山上爬。山顶的一路正和冯参谋长遭遇，山坡的一路也发现了我们在山沟里，便踞高临下开起枪来。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机枪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军又都是骑兵在马上枪打不准，目标又大，战斗力发挥不出来，要想作战，必须下马，把几匹马交给一人牵着，免得被枪炮声惊散了，其余的人才可投入战斗——这叫打马桩子。我一看，沟底毫无遮掩物，根本打不住马桩子。便命令部队快往北边山上撤，我自己带一个机枪班徒步向南山上爬，去接应冯参谋长。当我们爬到离冯参谋长只有二百多米远的时候，他们也看见我们了，并急忙扔出两颗手榴弹，乘烟雾弥漫之际，上马往我处撤。可是山上尽是一人多高的柞树丛。马一冲进去，树枝把他们两人先后从马上刮下，追来的敌人足有三百多人，为首的是一个戴绿呢四耳军帽的军官。他一见冯参谋长掉下马来，便一声喊叫，三百

多鬼子一齐站起来，端着刺刀向冯参谋长他们冲去。

我立即让三挺机枪一齐射击敌人，我带几个战士赶紧向前跑去，抢救冯参谋长。就在这时，山侧的一路敌人从后侧包围上来，他们用八八式掷弹筒连连轰击，炸坏了我们两挺机枪。侧射的重机枪火力，将我身边的战士射倒好几个，我刚一卧下，一发子弹便把我的皮包打了个大口子。

我抬头向上一看，只见冯参谋长从小裴身上摘下三八式马枪射击敌人，小裴双腿已经断了，跪在地下用双匣枪向敌人射击。冯参谋长枪法准，他们俩打得敌人一个接一个倒下，钢盔帽子顺着山坡直往下滚。那鬼官急了，又一声大叫，三百多鬼子一齐开枪，冯参谋长和小裴先后倒下去了。

情况万分紧急。山侧的一路敌人扑向我们，离我们也只有八十多米了，他们飞快地向我们冲来，我们正要迎上去和敌人拼杀。就在这关

关键时刻，我军撤到沟北的部队已经爬到山顶上了。他们马上用密集的火力将侧面上来的敌人压住了。藉着这个空子，我们几个赶紧撤下山来。当我们返到北山上时，只见南山布满了黄乎乎敌人。南山的山尖上，有一撮敌人正团团围着冯参谋长他们的遗体。战士们都哭了，大家向南山打了几阵排枪，把山尖的鬼子又打倒了几个。这也算是我们为冯参谋长和小裴同志致哀吧！

站在山尖上看得很清楚，不仅南山有敌人，东北山沟里也出现了日军的装甲汽车。我便带部队迅速向西撤。刚穿过一道山沟，迎面又遇到日军一个小队。战士们的火正没处消，便纵马一个冲锋，将三十多个鬼子逼进山沟的一个小河边。鬼子被打得没处跑，只好退到冰面上，这河有清沟，正当他们在清沟里连滚带爬时，我们一顿枪便把他们都打倒在水里。

这场恶战一直打到中午十一点钟才结束。我们估计敌人受到重大伤亡，弹药也消耗完

了，会很快离开这一战场的。我把部队撤到后边山里露营一宿，第二天又返回战场来寻找冯参谋长和小裴等同志的遗体，但遍找无着。我到前边任家窝棚打听，老乡说，日本鬼子已把冯参谋长的文件和名章得到，知道牺牲的是共产党员，抗联的高级指挥员冯志刚。敌人将冯参谋长的遗体整修净面后用大块药布裹起来，送到新京（长春）邀功去了。

冯志刚同志牺牲时只有二十八岁。他原是学生出身，生得浓眉大眼，高鼻梁，中等身材，是旧中华民国汤原县最后一任监督（县长）的秘书。因英俊能干，季监督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他。“九一八”事变后，季监督不愿当汉奸，带领全家老小上山躲起来，最后病死在山上。

冯志刚同志参加革命后，作战勇敢，多谋善断，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个知识分子，思想敏捷。更难得的是他很快掌握了军事指挥艺术。尤善游击战，每次战斗前必作缜密

研究，善施计谋。日本人认为六军将领中第一是李兆麟，第二便是冯志刚。

我和冯志刚同志三五年就认识。三六年他担任六军参谋长，我正在六军军部任保安团政治部主任（当时抗联师以上设政委，团为政治部主任），他作风民主，爱护干部，能和战士打成一片。在工作和作战中我受他的教益甚多。

这次西征，进入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困难较多，但他欣然受命，坚定不移地执行北满省委和六军党委的决议，在作战的同时，不忘进行政治宣传工作，使我党我军迅速赢得了呼伦贝尔地区人民的信任。

在冯志刚同志牺牲前三天，他还对我说，他十分想念他那躲在深山沟里的老母、妻子。不知她们在那严寒的冬季是怎么过的，能不能活下来！他长叹了一口气，又说，现在顾不得家了，没有国那来的家呀！

冯志刚同志的牺牲，是我东北党组织和东

北抗联的重大损失。据我所知，在抗日时期他是在呼伦贝尔地区牺牲的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人。

后来，三路军指挥部秘书徐紫英同志为冯志刚同志编写一首追悼歌。歌词是这样的。

一

国土沦丧，
人命草菅苦倍偿。
八载风霜，
黑水波涛如泪浆，
荒草长堤尸遍野，
哭嚎惨伤。
夕阳下，
古道旁，
悲声杀气壮。

二

游击阿荣旗，

战马驰骋走单骑。
血染征衣，
壮志未酬恨无极，
慷慨捐躯痛别离。
旆间铭题，
雪前仇，
永弗替，
追烈士，
腊月二十七。

继承遗志，完成使命

冯参谋长牺牲后，敌人立即加强了军事、政治攻势。敌人一方面又从齐齐哈尔开来三十多车敌军，在各条山沟里都布上汽车队和骑兵，截断我军给养供应，一方面派人给我们送信劝降，又用飞机大撒劝降传单，敌人扬言：你们这支部队最高领导人都死了，你们没有出路了，赶快投降吧！又称：凡投降者，当官的官升一级，当兵的给房子、给地、给马。这

时，不少群众不敢靠近我们了。在部队中，也有个别人思想波动，有的提出我们对呼伦贝尔地形不熟，语言不通，还是回江东老根据地去。一连牺牲了几个战士，连长在行军中竟离开队伍好几天才回来。我一看他动摇了，就撤了他的职，任命一连指导员姚士同兼任连长。

在这困难的时刻，我召集部队中的党员连开了几次会。同志们一致表示，虽然冯参谋长牺牲了，但省委、军党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只要还剩下一名共产党员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当时，敌人估计我们可能退却，向东返回老根据地。敌人便在东、北方向上布满了重兵，可我们偏偏向西，向敌人的心脏部位前进，敌人紧紧尾随，连续打了七、八天，我们胜利地摆脱了敌人，冲到博克图、巴林一带。

在前进中，战士们一面狠狠打击敌人，一面大力宣传群众。群众看到我军斗志旺盛，也坚定了信心。不少群众深夜骑马送来粮食。我

记得两位达斡尔猎手，他俩是兄弟，一次就骑来五匹马，带来三袋小米，足有五、六百斤重，临走连坐骑都一定要我们收下，他们还一再祝愿我们，希望我们胜利，盼望我们还能回来。

接着我们往阿荣旗、莫旗、巴彦旗以及雅鲁河一带活动。这里是日本掠夺我国木材的基地，林业工人很多。敌人在这里设立了很多管理采木业的“柜房”，柜房中一般有粮站、金柜、小商店、饭馆、赌场、妓院等，每处柜房均有日本守备队和山林警察队。

我军在这一带的林业工人的支援下，接连攻开了巴林、穷棒沟、卧牛河等七、八处柜房，消灭了大批敌人，得了很多给养和现金。战士们普遍换了新装、新枪、新马，士气极为旺盛。

这一带是日本人经营较早的地方，日军中普通列兵少，军官、士官多，他们一般都受过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中毒较深，遇到我军攻

击多半宁死不降。

一天夜间，在我们攻打巴林时，一个日军中尉从被窝里跑出来，他只穿衬衣就往外跑，我看他没拿武器，就没开枪，战士老金用日语喊他站住，可他却光着脚一直往山里跑，室外气温在零下四十余度，他只跑了二百多米就倒下，不久就冻死了。

当我们活动到乌奴耳附近时，听林业工人说，乌奴耳柜房有不少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在那里做苦工，日本人对他们极为残忍，冬天不给衣服穿，只围着草袋子，麻袋片伐木，冻死、饿死无数。我们决定立即前去营救他们。当我们来到离乌奴耳还有三十多里的一处山林时，被敌人的一个警戒小部队发觉，仗提前打响了，我们消灭了敌人，乘势冲到乌奴耳楞场时，果然发现前面有不少山林警察和日本人用刺刀逼着二百多人在楞场上集中。我们分两路向敌人冲过去，骑兵来得快，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就把他们冲垮了，十多名日本鬼子被战士追上

全打死了，剩下伪警察吓得四下乱跑。

这二百多人正是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原来在楞场上堆原木，这时也一下乱了起来，因我们穿的都是缴来的伪军衣服，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们有的夺下警察的枪支分成几股，拼命往山里跑，不管我们怎么喊，也没人回来。

因为敌人没有完全消灭，战场打扫得十分仓促，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姓车的病号，他是山西的一个八路军部队的事务长，当时正生着肺病，我们用马驮着他走，走了十多天，他因身体太弱，不幸病死了。我们把他埋在绰尔河边的一个山坡上，连指导员姚士同同志还为这位八路军同志立了个木头墓碑。

一九四〇年二月，我军已经在呼伦贝尔各民族中初步建立了威信，我便派一个战士化装去北安东找李兆麟将军，汇报冯志刚同志牺牲和部队的情况。

第一个交通员不幸被敌人抓住了。我又派

了一个姓吴的班长带个战士去送信。由于敌人一直在追踪围剿我们，这两个交通员又被敌人捉住了。我只好请一位同情革命的汉族老乡叫王春河的去讷河，给龙北地委书记方明玉同志送信。告诉他呼盟的局面已经打开，请他派一些同志来协助我们开展地方工作。王春河那年有四十岁左右，他拿了我交给他的十元钱路费和一匹马，毅然出发了。半个月后，他胜利地到达了讷河，将信交到方明玉同志手中。

方明玉同志马上派了刘纯、以及老交通员刘生等五名同志到达神泡子、马拉科一带开展地方工作。

随着我军的胜利，这一带的群众也觉得像有了主心骨，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他们竭尽全力来支援我们。

在阿荣旗西边山上，有一个小地名叫“野猪窝棚”，群众为了上山打猎、砍柴住宿方便，在这里搭了个木营。木营下半截挖的“地窖子”，上半截用原木垛起后支的盖。房内靠两

边有二铺木头长炕，当中拢火。一共能住四、五十人。

由于这里比较偏僻和险峻，我们就利用这个木营当了我们的“小后方”，把几个伤号放在这里养伤。同时又把它利用做交通点，附近的老乡都是通过这个“小后方”给部队送粮食。一个地名叫“赵家窝棚”的老乡们，拥军更是积极，他们主动来给伤员治伤，经常用大轱辘车给我们送粮。其它村屯的老乡，为躲过敌人的检查，就利用上山砍柴拉木头的机会，用大车给部队捎粮食、盐，有时还有猪肉、电池等物资。他们还经常通报敌人的动向，为我军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军部教导队有个班长叫胡玉树的，我们部队刚一到嫩江西岸，因天黑掉了队，他就在莫旗北格尼河东沿一个屯子住下，等部队回来时归队。这个屯上至嘎查所长，下至小孩子，全屯人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泄露过。敌人多次来过这屯，胡玉树同志始终没有暴露。当时日本人

规定，凡掩护抗联不报告的，要杀光全屯，这说明群众是真心爱护人民军队的。胡玉树同志一直等了六年，直到“八一五”解放，这位同志又重新把藏起的枪找出来，组织起一支队伍，后任我嫩江军区某团团长，在与国民党光复军作战中牺牲了。

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底，我们部队经过三个多月艰苦作战，纵横千余里，既消灭了不少敌人，又宣传了群众，初步建立了地方组织。我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加之，长时间和军部失去联系，嫩江又即将解冻，于是我决定立即率部返回嫩江东，向军部汇报情况，听候李兆麟同志下一步的指示。

我们告别乡亲们，踏过冰封的嫩江，来到德都县朝阳山一带，我们在这里正好遇上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同志带的部队，我们就共同打开克山县的北兴镇，然后一齐去北安东边山里找到了中共北满省委委员、抗联六军政治委员李兆麟同志。

李兆麟同志当年还不到三十岁，因操劳和生活艰苦前额的头发已开始稀疏起来。我向他汇报了我们首次征战呼伦贝尔地区的经过和冯参谋长牺牲的情况后，他对冯参谋长的牺牲深感惋惜，对我能坚定执行命令带领部队完成开辟新区的任务，又率部安全返回给予表扬。

第二次进军呼伦贝尔

一九四〇年四月，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整编，取消原来的军、师、团建制，改建成更适应游击战的路军、支队建制。

我们部队编入三路军三支队，由原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任支队长，原北满省委委员，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任政治委员，由我任参谋长。

三支队组建后，接连打开克山县城和四站、霍龙门火车站等日伪重要据点后，于四〇年九月第二次来到中腰站嫩江沿，准备第二次进军呼伦贝尔地区。嫩江宽约百米，水急而不

深，我们乘马涉流而过。

这次西征，北满省委是下了大决心的。三路军所辖四个支队（三、六、九、十二）中的二个支队（三、十二）一齐开向呼伦贝尔地区。

三支队的任务是：在继续开辟游击区的同时，尽可能打开一条道路，沿呼伦贝尔西部边境地区南下，力争与热河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我们临行之前，李兆麟同志一再嘱咐：“东北党与中央多年接不上关系，最近在报上看到八路军到了热河，辽西一带。你们如能打开与中央联系的通道，将中央的指示转来东北，这对于整个东北的抗战形势是有重大意义的。”但他也充分估计到我们深入呼伦贝尔西部后，困难将会极大。他授权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相机行事。

十二支队由戴洪滨支队长率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开辟游击地区，但十二支队在一九四〇年九月末打开肇源城之后，因故返回了海伦一带，没有开到呼伦贝尔地区去。

这样，还是只有我们一个支队开过嫩江、

到达呼伦贝尔地区。

血战阿尔山，毙敌一少将

一九四〇年十月的一天，我们来到阿荣旗西南鸡冠山的南坡一带活动。这里山不大，但山势较险峻，山上尽长着不太大的柞桦树。

这天刚吃过中午饭，就发现了敌人。这次来的全是日本兵，他们全穿着和秋季树叶一样颜色的黄军装，叫我们很难分辨。他们一直摸到我们跟前，枪才打响。

由于双方离得较近，全支队在一块集中活动目标太大。我们就分成两部分，由支队部率教导大队和四大队占据了靠西的一个山头，由八大队长尹德福率八大队向南面另一个山头冲去。

这次日军兵力很大，由一个日军少将统率，以三、四百人的大队（营）为作战单位，分成多股，企图抓住我们，制造战机。

敌人一看我们分成两部分，便立刻确立首

先要困住兵力较小的八大队，只见有一股日军直插我们与八大队之间的山沟，敌人的火力很猛，九二重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敌人的飞机也来助战，飞机飞得很低，银光闪闪的螺旋桨以及机舱里的驾驶员都看得很清楚，飞机一走，气浪打得树梢哗哗直晃，树叶像下雨般地落下来。

敌人成功地切断了我们与八大队的联系，我们发觉有陷入重围的危险，便立即向西北方向运动。由于大部分敌人都去包围八大队，我们很快就脱离了险境。

这时八大队情况十分危险，十多股敌人沿几条山沟齐头并进，想包围住他们。

尹德福同志是久经战场的老同志，他身上曾中过十八发子弹，被同志们称做“打不死的人”。他很明白敌人的意图，便率领部队急速向西南方阿尔山撤退。

有一股敌人紧贴着他们，一连打了两个多小时，翻了四座山头，还是没有甩开敌人。山

上树林很密，双方离得不太远，可又看不真切对方的准确位置。

当尹德福同志爬到阿尔山的山坡上时他在马上一回头，发现对面山坡上的一片空地上有一股敌人。他用望远镜仔细一看，原来是不少挎着战刀的军官围着一个穿黄呢军装的老军官在说什么。这老军官的领章上是一颗金星，在他的跟前还有几匹马。

尹德福同志估计这个少将是这股敌人的最高指挥官。他立刻跳下马，摘下挂在马身上的三八步枪，他估算了一下距离，足有五、六百米，他定了标尺，然后瞄准那个少将打了一枪。正中前胸，将其击毙，日寇军官们乱成一团。

尹德福同志这一枪就结束了战斗，敌人再也不来追击他们了，他们很快甩开了敌人，直奔人头碓子方向去了。

高禹民政委牺牲

天很快黑了，我们这一部份人马来到了一

个叫五马架的小屯子，准备在这个屯子等一下尹德福的八大队。这个屯子很小，只有七、八户人家。我们支队部到了一个老乡家，事务长王成买了点面，老乡为我们杆了点面条。我们原以为面条好熟，可以快点吃完。

面条熟了，刚放上桌子，就听外面“叭！叭！”响了两枪。我从窗户向外一看，外面街上竟有不少日本兵呼呼在跑，原来，敌人绕过我们的岗哨，闯进屯子里了。

王支队长，高政委和我分了一下工，决定兵分三路，各带一路，向外突围。

王支队长和我带的部队各杀开一条口子，冲到村外的山上。

高禹民政委带的一路也冲出了村子，刚转过沟口，正面又遇到好几百敌人。高政委立刻命令在一侧山头上卧下。这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危急万分。

王支队长和我见此情景马上带领部队返身，从两个方向上迂回过去，准备接应他们。

高禹民同志命令他带的部队往山顶上撤，由他自己掩护，支队教导队长安永化和战士们不肯走，他下了死命令。结果他亲自带一个机枪班，抢占了一块兀出的大石块，堵住了前面冲来的敌人。安永化同志看高政委没有走，他也留下来保卫政委，再加上我们两路的火力支援，被围部队的大部分顺着山坡向上撤出了战斗。

这时，屯子里满是敌人。各山沟里也有不少敌人的步、骑兵。我们三路部队且战且退，一直混战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后来，我们摸到了人头峪子那边一个炭窑，等到下半夜，尹德福同志带的八大队也转来了，可是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等到高禹民同志他们。

天大亮后，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又来到了五马架屯。老乡们讲述了高政委牺牲的情况。

据老乡讲，高禹民同志他们占据了那块大石头不久，就被上千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住了。敌人先是喊话劝降，高禹民同志不仅不为敌人所

动，反而让支队教导队长安永化同志向敌人进行喊话，机枪班的朝鲜族同志还用日语喊了话，表明抗联战士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敌人看劝降无效，便发起了进攻。在月色下，高禹民等同志与敌激战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十二名同志壮烈牺牲。老乡讲，敌人的尸体装了满满两汽车。高禹民、安永化等同志的遗体也被敌人拉走了。

另外，尹德福同志击毙的确实是日军一个少将军官。老乡看见敌人用两匹马驮一个担架，担架上放着那少将的尸体和战刀。

关于这个日军少将的死亡，日伪称之为阿尔山事件，并在此地立块“忠灵碑”。

我们来到高禹民等同志牺牲的地点，见大青石上血迹斑斑，遍布子弹击中的白点。石下的地面上，光子弹壳就铺了一层，可以想见当时战斗的激烈情景。

高禹民同志是依兰县人，在依兰县中学读书时任学校党支部书记，毕业后历任依兰县委

书记，下江特委委员，特委书记，北满省委委员，九支队政委，三支队政委等职。

高禹民同志中等身材，生得眉清目秀，方脸，双眼皮，有一颗虎牙，是个很英俊、精干的年轻干部，他思想敏捷，谈吐文质彬彬，清晰而有哲理，善于团结同志。

他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高禹民同志是冯志刚、郭宝贤同志之后第三个牺牲在呼伦贝尔地区的我军高级将领。

鸡心沟再毙敌一少将

高禹民同志牺牲之后，王明贵同志和我商量了一下，决定部队继续向西，深入到敌人纵深部位活动。

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了巴林和绰尔河之间的一个汉族人聚居的屯子，这个屯子有四、五十户人家。屯中有一个富裕农民姓李，有点文化，是个比较开明的人。他见抗日军来了，就主动献出一匹马。这马十三、四口混身上下重

白，个头不大，但极善走，走起来尾巴伸开与身体拉平，人坐马上可以看地图，速度比一般笨马跑还要快一些。我们推辞了一番，他坚决要送。他说，他作为一个中华子孙，因家口拖累，人不能去抗日，但一定要献上一匹战马，为抗日效一点力。我收下了这匹马，并叫事务长给他四十块钱。

后来，这匹马在战斗中多次将我带出险境，也拖带过不少伤员。四一年我负伤，马也受伤，便把它放到了山上。四六年我在孙吴县剿匪，又看到这马，这匹马还认识我。过了两天，这马就老死了。当时孙吴的同志们都说，这正应了“好马见了主人面才会死去”的传说。

我们在这个屯子住了两天，第二天的傍晚，有个上山拉烧柴的老乡回来报告说：“南面来了一大股人马。我们立即往北撤。晚上，在鸡心沟与日军遭遇，敌人来得很多，沟里，山上到处都看见敌人的钢盔在闪光。”

我们和敌人激烈战斗，后来打交手仗打惨了，一直打到天快亮了，双方才脱离战斗。由于日军是正规军，作战方式死板，我们的战士机动灵活，一般都有手枪，混战之中，打死敌军甚多。我们仅有教导队长张少华等三同志被敌人俘去。后来听群众反映，这夜又打死日军一少将。八一五光复后，张少华同志出狱，他也讲到这次战斗中，敌人的少将指挥官不知被我们那一位机灵的战士从背后打了一枪，把他击毙了。敌人为此还登了报。

遭遇险阻，返回江东

根据北满省委的指示，命令我们支队向西南方向前进，想一直穿过吉、辽西省的西部荒原，到热河与八路军联系上。我们越过卧牛河、雅鲁河、布特哈旗、绰尔河，翻过松岭一直打到了伊敏河上游的毕里图（鄂温克旗伊敏河上游）这里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大草原。草原上的草深及脚脖，没有什么路，到处可以跑汽

车。这地形对我军极为不利，平坦坦的草原连一棵树也没有。人根本无处藏身。吃饭、宿营必须用火将敌人打远才行。

这一路战斗异常艰险。日军接受多次自己出来讨伐我军遭受失败的教训。没有出动部队。而是调来了装甲汽车队、白俄步枪队和蒙古骑兵队来尾追我们。因日军是正规军，不善于运动战，又和我们一样人生地不熟，露营能力又比我们差，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而白俄步枪队和蒙古骑兵队却能吃苦，善于野营，骑术好，枪法准，地形又熟。

敌人一怕我们南下热河，二怕我西进蒙古人民共和国。采取了又截又追的打法。我们行军，敌人也行军。我们野营，敌人又摸上来打。我们的马累死了，得夺敌人的，可敌人每个人都有备用马。蒙古上层官僚还源源不断送上新马。这样，我们的速度就大大低于敌人的速度。日夜战斗使我军减员很大。同志们休息不好，眼睛都红了。头昏脑胀的，战斗力大大

下降。而这时我们才到达伊敏河的源头。这里距八路军的冀热辽根据地还有一千多里路程。我们看出，继续南下，人烟更稀少，道路更生。这样下去，不仅和八路军接不上关系，而且有全军复灭的可能。于是我们当机立断，返回江东。

由于前一个时期我们只求迅速南下，对尾随的白俄步枪队和蒙古骑兵没有给予有力打击，这两股敌人气焰嚣张，现要东返，必须狠狠教训一下这两股追兵。王明贵支队长决定由他带七大队前行，由我带一小部分精干部队打击追兵。

一天，我们转回到卧牛河东的山区，天刚黑我们就露营了。我们有意在林中拢上几堆火，然后部队开始休息。我带一部分人往回摸去。走了几里路，翻过一个杂树岗子，便发现了白俄步枪队也在露营，这帮匪徒全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多是原沙俄军官，反共坚决。他们这时没有卸装，正在吃饭，

看来他们要在夜里袭击我们。

我们分成两路向前爬去，当距最近一个大火堆只有百十米了，突然看见敌人的一匹马扬起了头，嗷嗷叫起来，这说明这马发现生人。我立即打了一枪。随着这信号，按事先计划，一部分同志用机枪猛扫大群敌人和军马。我带另一部人一齐冲向最近的大火堆，并连续投出两轮手榴弹，在烟尘中我冲到被炸熄的火堆旁，只见四、五十个白俄匪徒大部份已经炸死了，有的嘴里还嚼着烤羊腿，地上满是白俄旧军队的筒式卷毛帽子，红里子的呢子大衣和装着烧酒的方形军用水壶，有个大胡子白俄分子，大衣里面是一身漂亮的兰绿色军装，黄铜扣子上是铁锚，我估计是个沙俄海军军官。乘乱我们迅速撤出战斗。这一夜打痛了敌人，我们睡了一宿安稳觉。

又过了两天，我们发现蒙古骑兵队离我们只有十多里地，不即不离地尾随着我们，可又保持一定距离。我们决定也给他个回马枪。

王支队长带着大队浩浩荡荡翻过一个山岗而去，我带伏兵埋伏在山坡前。并规定我不开枪，谁也不准开火。由于一路行军疲乏极了，太阳一晒，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追上来的蒙古骑兵离我们很近了，我还没醒，战士们仍然伏着一声没响。这时，有十多个骑兵已经走到我的侧面二十多米的地方了，战士朱学成急了，爬过来推了我一下，我才猛醒过来，我急忙抬手打了一枪，打倒了一个骑兵。接着，战士们的枪声大作，因离得太近，敌人在马上无处躲藏，直打得敌人纷纷落马，走在前面的几十个敌人很快就被我们消灭了。后面的敌人落荒而逃。蒙古骑兵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敢近战，更怕死人。一看死了这么多人，便压不住阵脚，退马下去。

奇怪的是在我们阵地前的敌人的几十匹马都不跑散。有的在打转，有的干脆站在那一动不动。我们上前很顺利地都抓住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敌人的马负荷太重，每匹马都驮

着十几、二十条满装子弹的子弹袋，光子弹就有百八十斤重，所以马都累得汗漉漉的，主人一死，连动都不能动了。

我们两战两捷。敌人尝到了苦头，就躲得远远地。我们又进入了山区，很快甩掉了敌人。经过十多天的行军，来到了千里冰封的嫩江边。我们再次踏着坚冰，返回了江东。

党的忠诚儿子

北满省委原来决定我们三支队在前，让九支队随后开进阿荣旗、莫力达瓦旗一带继续发动群众，建立地方组织。

以郭铁坚支队长，曹玉奎参谋长为首的九支队，四一年秋刚一过嫩江，在莫旗北部就被上万日军和蒙古骑兵团团围住，战斗异常激烈，直打了一整天，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英勇的九支队打退了。第二天，敌人又调重兵，以榴弹炮猛轰，并有装甲车发动攻击。最后九支队弹药消耗殆尽，郭铁坚，曹玉奎等大部分同志壮

烈殉国。仅有十五大队指导员孙志远带马广荣、秦长胜、曹正祥、陈忠岭等共八名同志，携带两挺机枪，硬打开一个口子，冲出了包围圈。

这些同志在异常艰险的情况下，没有动摇，没有忘记他们要开辟游击区的使命，他们坚持往阿荣旗方向前进，想找到三支队。可三支队刚刚离开阿荣旗西进了。他们没能找到。这些同志就在阿荣旗的山上坚持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森林警察，袭击敌人的木材运输线。在艰苦的环境中，八名同志中的两名伤员，因得不到医治，也先后牺牲了。孙志远同志带领五名战士，坚信三支队一定还会来到这里，就在这里的山上一直坚持活动了两年多。

一直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春天，还没有等到大部队，他们就决定返回江东寻找。他们走到江东的讷河境内，又被敌人发现，敌人强迫上万群众手拉手拉大网围他们。但讷河是老根据地，群众的心是向着党，向着抗联的，他们在一片麦地中被拉大网的群众发现了。一个小伙

子高声叫：“大伙儿绕着走哇，这块地湿，容易陷脚！”群众立刻让开一个豁口，从两边绕了过去，也没有向敌人报告。这六名同志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终于找到了周保中、李兆麟同志带的大部队。他们带的两挺机枪和其他武器装备都完好无损。这六位同志真正是党的忠诚儿子。

第三次进军呼伦贝尔

北满省委开辟呼伦贝尔游击区的决心始终是坚定的，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又决定我们三支队第三次开进呼伦贝尔地区。

这时，三支队政委高禹民同志牺牲后，没有政治干部。路军指挥部就把我由参谋长改任政治部主任。

敌人吃过上两次我们过嫩江后的苦头，为了防止我们再次过江，也为了堵截我们西进，他们在沿江布置很多机动部队。我们为了能顺

利地过江，必须将江防敌人调开。我们先来到了西进呼伦贝尔地区的跳板——我们的老根据地讷河县。

我们与地方党的领导，龙北地委书记方明玉同志接头。他谈到地方组织经费很困难，我们就拨给他五千元伪币做经费。我们共同商量了如何继续发展和建立呼伦贝尔地区党的组织，如何发动群众抗日，如何做少数民族工作等问题。

为了调动敌人和松懈敌人嫩江西岸的防务。我们故意向东北方向前进，这样离嫩江越远，以造成敌人的错觉。引逗敌人来围堵我们。当我们走到德都北、五大莲池西边时，果然与前来堵截我们的伪军李同部队相遇。经半天激战，消灭了李同部队。我们三支队乘胜继续往东北进发，打开了嫩江县东边的四站，消灭了自卫团和嫩江县南大营的一个伪军连，然后又进到黑河地区，打开罕达气金矿，缴了日本守备队的枪支和马匹。

这时，我们身后有多股敌人尾追。我们立即急行军摆脱他们，然后向西急转，直奔嫩江。部队到达嫩江沿的八站、腰站时，只有一股警察队和日军组成的部队还在尾追我们。我们回过头来打了他们，战斗中，指导员郭成章同志身负重伤，仍独自一人缴了二十多警察队的枪支。

由于连续作战，部队有不少伤员。我脖子负伤，中队长尹德福也负了伤。经过支队研究，决定部队暂时分两部活动。我领一部分队伍和伤病员留在嫩江东沿古鲁河一带，找一处保险的地方盖盖房子，治疗伤病员。其余大部队由王明贵支队长率领，过嫩江，进入了呼伦贝尔地区。他们过江后从加格达奇南下，经大杨树之后，过甘河，到达巴彦旗地区，他们发动群众，到秋天渡过诺敏河深入阿荣旗界，缴了镇威庄中伪区长刘少一率领的区警察队。

我带这部分伤员在古鲁河找了一处地方隐蔽下来，同志们分头采了些山草药和老鸱眼及

马屎梢树皮熬水给伤员洗伤口。我也成了外科大夫，用剃头刀子给伤员开刀，动手术往外取子弹。地方群众也经常送一些给养来，经一番积极治疗，我们这部分伤员基本痊愈了。于九月初我带着治愈的伤员队利用大柳条绑船筏子，外裹马皮，用一个马皮筏子渡过嫩江。到了大杨树以南屯子李春生家，搞了些米之后，渡过诺敏河缴了附近一个嘎查所的械，来到木奎山西边屯王少章家与王明贵先头部队汇合了。接着，我们支队打开了边壕南的双泉镇的警察署，并缴了敌人的械。

发动群众抗日

这时，苏德战争已经暴发，日本帝国主义由孙吴县到嫩江县之间布置几十万日伪军。准备德国打进莫斯科时，日方从远东乘机进入苏联乌拉尔以东地区。这时，三路军指挥部命令我们三支队继续在布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博克图、牙克石一带发动群

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主动进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日寇进攻苏联。

秋后，我们在阿荣旗北部和莫力达瓦旗格尼河两岸农村活动。这一带半山区群众抗日热忱非常高，并建立了一些抗日救国会，阿荣旗北边屯子的赵家窝棚、于家沟、于梁庄、边壕北王家炉的抗日救国会的组织较强。如掉队的胡喜才就是在莫力达瓦北边一个屯子抗日救国会掩藏下一直到八、一五解放，这是很不容易的事。

阿荣旗北部山区现霍尔气公社东山根大队郭秀章、郭兆兴哥俩都为我们工作。他们还动员几位木炭工人参加部队。我们决定让他们单独组建一支地方小游击队，就给他们留下一枝步枪，一支匣枪。八、一五解放时，他们首先缴了伪自卫团，建立人民自卫军，郭兆兴当了团长。

一九四一年冬。我们三支队北进，深入博克图，孟德仁给带路，缴了日本人木作柜房二

十六号，得到很多米面和服装，解决了部队过冬的棉衣。然后进入大兴安岭的腹地小二沟、阿里河鄂伦春族聚居地区。发动鄂伦春族同胞起来抗日。

鄂伦春族同胞性格直爽好客，他们对日本鬼子和汉奸非常痛恨，由于我们是抗日队伍，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很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特别是盖山头人，他非常信任我们，佩服我们，称我们为英雄。他们一家对我们极好，不管风大雪深，也不顾冻得呲牙咧嘴，经常在半夜三更给部队送信，他十六岁的女儿还经常拿枪上山给我们打狍子，解决肉食。现在的鄂伦春族自治旗副旗长白日尔图，那时才十几岁，也有一股抗日热情，也跟着跑前跑后，发动群众，收集给养等。

由盖山提出，经支队党委研究，我们尊重鄂伦春族同胞的风俗，支队几位领导人与鄂伦春头人结拜为兄弟，盖山年长，为老大。不久，盖山由于年老得病而死。按他们的习惯把遗

体放在树上，我们部队得知他病死的消息极为悲痛。王明贵支队长特地带队前去看望，并拿出一笔经费托人由山下买来一口上等棺材，将盖山的遗体从树上卸下来，装入棺材里掩埋，同胞们痛哭了一场，告别鄂伦春族同志。

夜袭扎顿河车站

离开了鄂伦春族地区，我们转战到牙克石以北的扎顿河。一天晚上行军，正赶上西北风大作，刮的雪暴对面不见人，迷失了方向。正当我们艰难地在暴风雪中行进时，遇上了一条拉木样子的爬犁道，支队长王明贵同志和我研究一下，把部队往后撤一撤，留三、四个人在道旁蹲着，等拉木样的爬犁来再问明方向。中队长尹德福和大用等同志帽带系得严严的，两只手插在袖口里抱着枪在严寒中等在道旁。不太长时间，来了一张二马爬犁，老板子穿一个没面的大皮袄，顺着风坐在木样上，两个马拖着爬犁顺着雪道往前走。尹德福上前把马笼头

拉住。赶爬犁的老板眯着眼喊：“架！架！”大用上去推了一下赶爬犁的老板子说：“老乡，下来吧，爬犁到站了！”老板子抬头一看，当时吓了一跳。尹德福上前说：“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请你到我们首长那去谈谈吧。”老板子下了爬犁，随着尹德福来到我们跟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李洪生，山东人。

王支队长问，这一带那里有日本柜房？李洪生说，离这六、七里路就是扎顿河车站柜房。

“那里有些什么兵？”王支队长问。“你们是红军吧？”李洪生反问。王支队长接着说：“你再说就远了，我正是红军。”“你！你！你们真是红军吧？”“是的。”我点着头也说。“这可好了，我的家乡就有红军、八路军。你们要打日本鬼子我一定出力。”

王支队长叫李洪生详细讲讲扎顿河敌人兵力。李洪生介绍说，前几天那里刚开来一个骑兵连，都是捷克式马枪。还有不少机关枪。另

外，还有二十多个日本兵，也有机关枪。日本兵住在前院，那个骑兵连都住在一个大马架筒房子里。在地下铺的草，枪都在墙上挂着。王支队长考虑敌人很多，并且有二十多日本兵住两下。认为得仔细研究一下作战方案，才能全歼敌人。我出主意说，今晚风雪交加，大风刮得呼呼直吼，站岗的不一定老在外边，说不定常进屋看香头呢。咱们兵分三路。一路尹德福同志带八大队，由李洪生带路，去消灭敌骑兵连，我带教导队去缴日本鬼子，王支队长率领其余兵力随后相机策应。王明贵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我带教导队摸到前院，果然没遇上敌人的哨兵，我把一部份人放在日军住房的一头，另一部分布置在日本兵住房正门前边。我让大家先不要动，待尹德福那边枪一响，日本鬼子非往外跑不可，这时，我们侧面和正面一齐开枪射击，将日军消灭。大家耐心等待。十几分钟后，尹德福同志他们打响了，震耳的枪声在夜空中传来。果然，日本兵衣服不整地慌忙往外

跑，正进入我们的枪口下，将日本兵打得连滚带爬，鬼哭狼嚎似的乱叫。一个日本鬼子躲开子弹流，竟跑到我军侧面人群里来了。被教导队中队长，身高足有一米八十的修身同志拦腰抱住。这鬼子乱蹦、乱跳。我急叫修身将头往旁边歪一歪。修身同志一歪头，我甩过匣枪叭，的一枪把日本兵打倒了。

尹德福他们在老乡李洪生的指引下，也进展顺利，他们先摸到敌骑兵连住的大筒房子。李洪生出乎意料地勇敢，他一直把冲锋队领到伪军连队住的门口，恰好站岗的真的看香头去了。李洪生上前一个箭步把门打开。尹德福带两挺机枪堵住房门口。屋里的伪军有的要起来去摘枪，被尹德福咣咣两匣枪打倒了。战士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交枪不杀”。同时冲进屋里。这些伪军都像癞蛤蟆一样，趴在草铺地下，一动不动。枪支全部收缴下来。除步枪外，还有轻机枪五挺，全鞍马一百多匹。

李洪生说什么也不愿在此拉样子了，他带

着两匹马参加部队，后来成了我们支队一个勇敢的战士。

在扎顿河车站柜房吃过早饭，套了几张马爬犁，将收缴的枪支、弹药、给养、衣服和其他军用品拉着，往沟里走，一路上尽是日本人开的伐木场。我们商量要招些伐木工人参军。当路过一、二、三号木营时，我都召集工人们，向他们讲了话。当说到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是红军时，一些从山东被日军抓来的劳工便把大斧头一扔。高叫，这回我可有出头之日啦！日本鬼子硬把俺们抓来的，红军来救俺们来了，我们都去当抗日军。三个木营的工人立即响应，有以苏广东、孟宪庭为首的二百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部队。随即发给他们每人一枝捷克式马枪，他们可高兴啦。

最后一次战斗

一下新来二百多新兵，他们既没参加过战斗，连枪也没有放过。必须找一个地方有一个

训练他们的机会。我们决定往东边深山老林里走。走了三天，估计敌人不可能尾追这么远，我们就在诺敏河上游休整了一下，对新兵进行射击训练，每人打了三枪。结束后又走了一段路，来到甘河一个河岔的源头上现在叫吉文的地方。这天晚上就地露营。八大队住前，支队部居中，七大队、九大队在后。拢起火堆，支队部召开欢迎新兵入伍晚会。先由我讲讲今晚开会的意义，然后王明贵支队长讲了话，接着老战士唱了一些歌。大队与大队间相互拉拉歌子。露营之歌是必唱的，来了个全支队的合唱。新兵不会唱革命歌曲，但他们听老战士唱革命歌曲听得入神了。都被革命军队团结、乐观的情绪所感动。

开完晚会，各自回到自己队里，支队部有个小布帐棚，用一个小汽油桶作的火炉子。陈雨田等四、五个同志先进里边睡下了，王支队长就炉口亮光缝他的“奇克密”（鄂伦春族同胞爱穿的一种狗腿皮做的一种皮靴。）我在一

旁捅火烧炉子，还没等我们脱衣服，就听到前边咣咣连响几声，我推开帐棚房门一看，前边八大队被敌人打得火堆直串火星子。不好，敌人夜袭来了。我抽出匣子枪就是一梭子子弹朝空中打出去，惊醒了火堆旁的教导队机枪射手小叶升。他一翻身拉起机枪手杆就向前边敌人猛烈开射。这顿机枪顿时把敌人火力盖住了。八大队借机整顿了一下，开始反击。我军的几十挺机枪一起响起，像狂飙飓风似地一顿猛射，将敌人打跑了。又搜索了一下战场，把惊散的战马找了回来，一清点，各种装备什么也不少。

部队开始转移，过了甘河，沿多布库尔河西沿往嫩江源头走去。翻过嫩江顶子，就到伊勒呼里山，山的北面是呼玛尔河，山下面有个大乌苏门金矿。我们就在那里整训新兵一个月。王支队长讲军事课，陈雷同志讲政治课，我整顿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党的教育。王支队长和我都会点木匠活，我们俩在课余做滑雪板和爬犁，以方便上下山运转给养。

一个月的新兵训练计划完成后，部队开始向北，于一九四一年冬离开了呼伦贝尔地区。进入呼玛县界，展开新的游击活动。

至此，历时两年的西征呼伦贝尔地区的战略行动结束了。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再也没有到这一地区。一直到八、一五解放，我才有机会见到呼伦贝尔地区的各族兄弟们，如鄂伦春的孟德仁、占竹梅、达斡尔族的德巴戈布、德荣——等等，我们在一起畅谈解放后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的突飞猛进的变化，也共同回忆在艰苦岁月中我们共同进行的每一次战斗，谈到呼盟地区那非常熟悉的山山水水。更不能使我们忘记的，就是那些把革命的道理和党的声音最先带到这一地区，并为这一地区的解放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冯志刚、祁宝贤、高禹民、郭铁坚、曹玉奎等数百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和英勇的指战员们。

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呼伦贝尔各民族兄弟的心中！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伦贝尔文史资料选编第一

作者 =

页数 = 59

SS号 = 0

出版日期 =

正文